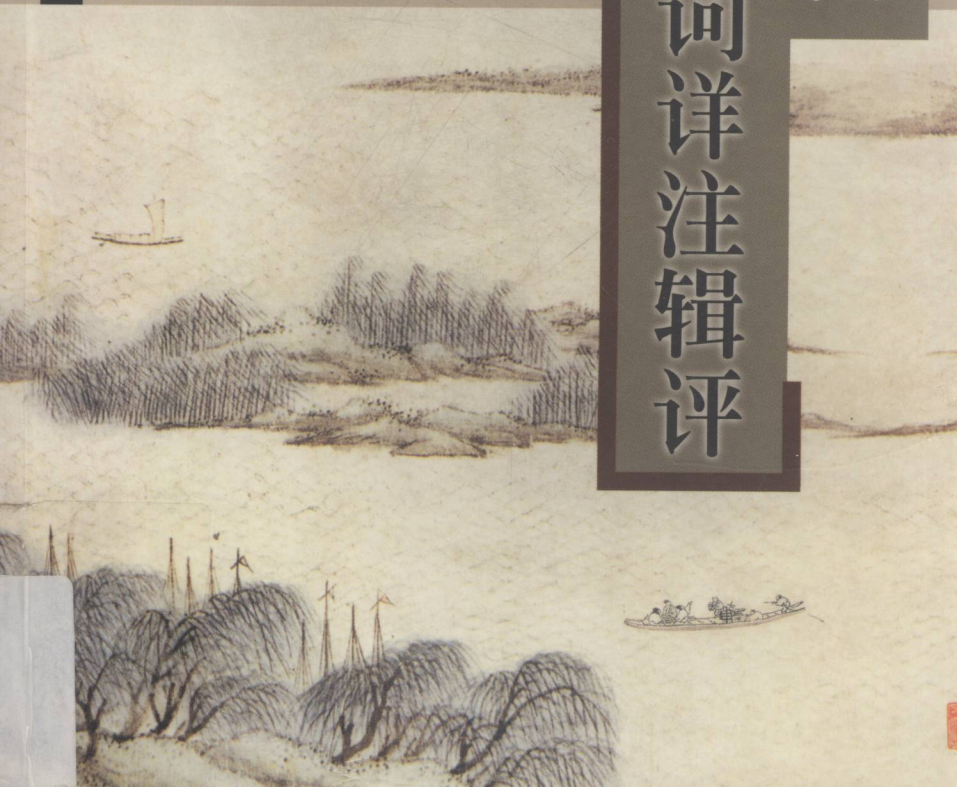


欧阳修 苏轼

王秋生
辑注

颍州诗词详注辑评

黄山书社



欧阳修 苏轼 颍州诗词详注辑评

王秋生/辑注



黄山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欧阳修、苏轼颍州诗词详注辑评 / 王秋生辑注;—合肥:黄山书社,2004.12

ISBN 7-80707-095-1

I.欧... II.王... III.诗词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北宋
IV. I222.744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41111 号

出版发行:黄山书社

地 址: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

印 刷:安徽省地质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16.875

字 数:480 千

版 次:200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数: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0001—2000 册

定 价:28.00 元



欧阳修石刻像(现存颍州西湖会老堂)

翰林平日接羣公文紙相激慰福翁
 回首轉回黃約黃靡論道愧無功
 攀藉路斷金山速憂國心危面箭攻
 今夜靜聽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

夜宿中書東閣

攻字同謫



右歐陽公嘉祐八年冬末詩
 昭陵以是年春晏駕十月復土時
 厚陵無屬疾兩宮情意未通故有攀藉

欧阳修手书《夜宿中书东阁》



苏轼像 (元)赵孟頫作

元祐六年十月潁州久旱
聞潁上有張龍公神樞
靈異乃齋戒遣男迨
与州學教授陳履
往禱之迨二頗信敬

苏轼手书《潁州祷雨帖》（局部）

序 一

北宋时期,文学宗师欧阳修、苏轼先后知颍州,为颍州增添了耀眼的光彩。王秋生先生把欧、苏在颍州时所作诗词和离颍州后所作有关颍州诗词,汇为一编,加以注释,对人们认识、了解、考察颍州,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王先生这本书立足点是提高,同时照顾了普及。一般的读者可以通过本书明白晓畅的注文读懂欧、苏二公的诗词;希望作深层次了解、研究的读者,可以从本书得到他们需要的知识。可以看出,王先生着实吃了不少苦头,下了不少工夫,很不容易。说很不容易,是因为作注决不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,只要查查字典、辞书,利用前人旧注就行了。作注是一项严肃的、细致的、富有创造性的劳动。

北宋时期颍州州治是现在安徽省的阜阳市。王先生生在阜阳,长在阜阳,熟悉阜阳,了解阜阳,他考察了阜阳的历史变迁,考察了如颍州西湖、会老堂这些胜迹,来去清晰,要言不烦。这就构成了本书的一个鲜明特色。一九八九年二三月间,我应设在阜阳市的阜阳师范学院汤华泉教授的邀请,在那里住了几天。汤先生曾经陪同我在昔日的颍州西湖——今日的干涸地上畅发过思古幽情。读王先生的书,我感到十分亲切,有不少收获。

王先生的书是一本切合实际需要的好书。我作为这本书较早的读者,先写一点感想。权作为序。

孔凡礼

二零零四年十月四日于北京

序 二

一

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,欧阳修是英勇无畏的旗手,苏轼是名副其实的主将。他们分别团结了大批才情横溢的作家,携手铸就了北宋文学的辉煌。然则欧、苏的首次相遇,却颇富戏剧性。

宋仁宗嘉祐二年(1057)正月,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,他的诗友梅尧臣充点检试卷官。当时,欧阳修倡导“古文”,而“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,号‘太学体’。(欧阳)修痛排抑之,凡如是者辄黜”(见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)。来自眉山的苏轼携弟辙应礼部进士试。苏轼自称“长于草野,不学时文,词语甚朴,无所藻饰”(苏轼《谢梅龙图启》)。梅尧臣阅卷时发现了苏轼所撰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,认为文风似《孟子》,笔力豪骋,迥异时文,遂推荐给欧阳修。欧阳修见文亦惊喜,认为作者不同凡响。因考卷封闭作者名,欧阳修本拟评该文为冠,又疑心是自己的得意弟子曾巩所作,为避嫌而违心地评此文为第二。发榜时方知是素不相识的苏轼所写。对此,苏辙所撰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及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卷八都有详实的记述。这次考试,曾巩、苏辙亦为同榜进士,欧阳修为宋王朝发现了一批英才。

这次考试还引发了文坛一场风波。那些崇尚险怪奇涩之时文的考生不服输。“毕事,向之器薄者(按,指擅长‘太学体’自命不凡的狂傲考生)伺(欧阳)修出,聚噪于马首,街逻不能制。”那阵势,似乎要掀动一股学潮,不惜以破坏社会治安为代价来围攻、威胁主考

官。欧阳修以大无畏的气概顶住各种压力，终令“场屋之习，从是遂变”（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）。后在欧阳修推举下，苏轼“父子隐然名动京师，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”（欧阳修《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》）。苏轼与其父洵、弟辙以他们行云流水般的散文创作，雄辩晓畅的政论文章征服了读者，也征服了当初的反对者，为古文运动奉献出足以傲视后人的实绩，确保了欧阳修整治文风的胜利。

关于嘉祐二年礼部考试，还有一个小插曲。原来苏轼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中曾引经据典云：“皋陶曰‘杀之’三，尧曰‘宥之’三。”欧阳修记不得典故出处，梅尧臣也想不起来了，只是“大加称叹”，认定是美文。欧阳修对梅尧臣说：“此郎必有所据，更恨吾辈不能记耳。”适逢苏轼登门拜谢恩师，欧阳修顺便问起引文“见何书”，苏轼随即答道：“事在《三国志·孔融传》注。”但是“欧退而阅之，无有。他日再问坡（指苏轼），坡云：‘曹操灭袁绍，以袁熙妻赐其子丕。孔融曰：‘昔武王伐纣，以妲己赐周公。’操惊问：‘何经（书）见？’融曰：‘以今日之事观之，意其如此。’尧、皋陶之事，某亦意其如此。’”（引自杨万里《诚斋诗话》）

苏轼不愧为才子，但毕竟年轻气盛，还有些顽皮。至此，无异招认了自己在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中，“想当然”地编造了一个历史典故。面对此情此景，主考官被考生戏谑的尴尬，虽令欧阳修“大惊”，但并未失去理智。于是感叹道：“此人可谓善读书，善用书。他日文章，必独步天下。”（《诚斋诗话》）他没有肯定杜撰事典的小把戏，但依然表扬了这位后学晚辈“善读书，善用书”，依然赞赏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写得好，还鼓励说苏轼前途无量，“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”。这是何等的气量！后来苏轼“复以《春秋》对义居第一，殿试中乙科”。欧阳修助苏轼通过皇帝殿试这道关后，给梅尧臣写信表示：“老夫当避此人（苏轼），放出一头地。”（苏辙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）欧阳修奖掖后进、扶植青年、甘愿为“人梯”，替新人“让路”的精神，至今仍闪耀着灿烂的光辉，给后人以启迪，让庸人警

醒。

从此以后，苏轼始终不敢忘记、也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栽培、扶持，一直追随恩师欧阳修，把欧阳修开创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进行到底。文学史上一段佳话，让苏轼的名字永远与欧阳修的提携不能分离。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，“欧苏”并举成为宋代“古文”鼎盛的标志。

二

当历史的长镜头在颍州小郡聚焦探寻时，人们惊奇地发现，北宋文坛巨擘欧阳修和苏轼，历尽艰辛、备尝甘苦后，以他们不朽的诗篇在这里“会师”了。颍州（今安徽省阜阳市）处在宋都汴京（今河南省开封市）通往江南的要冲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累曾使它成为文人墨客向往之地。例如苏轼之弟苏辙，亦荣入“唐宋八大家”之列。他与颍州实无多少瓜葛，晚年偏偏自号“颍滨遗老”，令人称奇。北宋皇祐元年（1049）三月至次年七月，欧阳修自请出知颍州，在此留下五十余首诗，可称之为“知颍之什”。此后又有短期居颍及长期思颍之作，时间跨度二十余年，诗词六十来篇。其中号称“思颍之什”者三十篇，欧公尝自为之序。最后在熙宁四年六月至次年闰七月，欧阳修致仕特地请归颍州，又写下包括绝笔在内的二十首诗词。他简直把颍州视如第二故乡了，情真意切。

苏轼曾于熙宁四年到颍州专访暮年欧阳修，且有诗词唱和。此后又吟出不少思念欧阳修、纪念欧阳修的诗词。元祐六年（1091）八月至次年三月，苏轼也是自请出知颍州。在此兴修水利，疏浚西湖，造福于颍州百姓，同时留下七十来首诗词，是谓坡公“知颍之什”。此后又写过十余首同颍州有牵连的诗词作品。

大约半个世纪内，欧、苏二位宗师虽不同时，却被同一个颍州所吸引，并都为后人留下数以百计的诗词作品用来歌唱颍州，神往

颍州,念念不忘颍州。此非巧合,实因颍州魅力独在。

请允许我实话实说:无论欧阳修还是苏轼,他们的知颖、居颖、思颖诗词,除个别名篇佳作外,多数不属于二位大师的代表作,尤其在艺术表现方面并未形成什么“颍州诗风”。但这些诗词客观记述了他们在颍州的生活与交游,真实描绘出这里的风土人情,也铭刻着他们在此地的德政。这是留给颍州百姓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,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篇章。

有感于此,生于颍州(今安徽省阜阳市),大学毕业后在颍州奋战了二十来个春秋的王秋生君,独出心裁编撰了《欧阳修苏轼颍州诗词详注辑评》这部学术专著。这是地方文化建设中值得称赞的创举,也是传统文化研究中别具一格的新课题,闻之令人鼓舞。

三

我与王秋生君素昧平生。大约在2003年3月,忽然接到秋生大札,告以编撰上述专著事,征询我的意见。他说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,购得中华书局出版的《欧阳修全集》、《欧阳修资料汇编》、《苏轼诗集》、《苏轼文集》、《苏轼词编年校注》、《苏轼资料汇编》、《苏轼年谱》以及《苏辙集》等,发现这些专业图书的责任编辑皆署名刘尚荣,遂认定刘某应是研究欧阳修与苏轼的专家。在确定以上诸书作为《详注辑评》一书之底本与主要参考资料的同时,便致函刘某以求“指教”。然而我对秋生一无所知,此事让我举棋不定,只能不置可否。数月之后,经中华书局同仁祝安顺先生引荐,稍知秋生君治学的辛劳与求助的渴望。他的执着让我觉得有责任也有义务助其成功,于是彼此书信往来。今年酷暑,作者寄来《欧阳修苏轼颍州诗词详注辑评》清样嘱我审核并求序于我。我因公务繁忙紧张,便转求文史专家孔凡礼先生鼎力协助。我与孔凡礼先生分别抽查核正了欧阳修与苏轼的颍州诗注,也分别做了一些补正。因出版

日期紧迫,我们的编审加工基本上是凭着感觉来进行,实在是粗疏且难免有疏漏。但在审稿的过程中,也切切实实感受到王秋生君对这部专著,可谓呕心沥血了。

如前所述,颍州诗词不属于欧、苏代表作。苏诗纵有旧注供参酌,但前贤未把颍州的苏诗当做笺注的重点,训解考辨每每缺如;欧诗则连旧注也没有,更是白手起家,从零起步。加上阜阳地区图书文献资料亦无法与京都相比,囿于见闻,从事“详注”之难可想而知。可喜的是作者知难而进,苦战三年,终于脱稿。其学术勇气与拼搏精神令人钦佩。

“详注”之详,表现在作者对诗词涉及的人名、地名、官名,名物、典章、故事等皆详加考述,词语典故追本溯源,引经据典翔实出处。附以必要的串解,有助于探明诗旨。写作时间与背景的交代见诸“题解”,而历代评论散见于“题解”与“注释”中。这样的体例或许不是最完美的(我总以为历代诗评、词评与相关考辨应列专栏,不与“题解”、“注释”混),但是却简单醒目。

此书注释有两个明显特点。

其一是适当采用方志资料,这一点在考注颍州名胜古迹、地理沿革的注条中最能显示优势,也最易达到精确。例如关于晏殊、欧阳修等人在颍州遗迹的注释,大都详赡可信。观注自明,无须赘述。这是某些专业注家往往忽略的问题,秋生之注有填补空白的意义。

其二是注意汲取最新科研成果。例如“先辈”,通常是指前辈,如刘禹锡《与歌者米嘉荣》诗:“近来时世轻先辈,好染髭须事后生。”又可称指依次排列于前者,如《诗经·小雅·采薇》:“采薇采薇,薇亦作止。”郑笺:“西伯将遣戍役,先与之期以采薇之时;今薇生矣,先辈可以行也。重言采薇者,丁字行期也。”又科举考试同时考中进士的人互称先辈,唐·李肇《唐国史补》下:“得第谓之前进士,互相推敬谓之先辈。”对此,宋·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及清·顾炎武《日

知录》都有专章考辨。然则上述训释用在欧阳修《获麟赠姚辟先辈》诗的注释中都不合适,姚辟的年龄资历在欧阳修面前堪称后生晚辈,姚乃与苏洵同修《太常因革礼》者。本书采纳了孔凡礼先生的最新考证,认为“先辈”还可用作对文人秀才的敬称,即清·张尔岐《蒿庵闲话》所云:“唐宋官长称秀才曰先辈。”(孔文见《书品》1997年第3期)于是诗意晓畅矣。

“详注”中还可看到作者千虑一得的创见,发人深省。如欧阳修《西园石榴盛开》诗:“红房初日照时繁。”众所周知的是“红房”谓红色房屋,有时象征高雅,如曹唐《小游仙》诗之六十一云:“细腰侍女瑶花外,争向红房报玉妃。”但欧诗借指石榴花。石榴花何以称“红房”呢?注者详解云:“石榴树夏季开花,花有结实花和不结实花两种,多呈橙红色。萼革质,结实的花萼后成为果实的外皮。房,泛指结构或作用似房子的东西,此指石榴外皮。”接着还引了两条书证。本来用“红房”赞石榴实属罕见,也有些费解,今经注者博引考述,非但词意明,诗的意境亦更鲜明。

自然,偶有“详注”求解过深或书证欠妥者,时急未能抽换,留下些许遗憾。某些“题解”对诗旨的求索亦有待深入。白璧微瑕,无碍全书之学术质量。相信此书的正式出版,将会促进欧阳修与苏轼诗词的全面研究“更上一层楼”,将会推动颍州(今阜阳)地方文化建设更加突现其“中国特色”。王秋生君定当不负读者,读者亦定能开卷有益。

是为序。

甲申年八月廿四日,北京刘尚荣,于中华书局

前 言

一代文史大师陈寅恪先生有言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年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”（《金明馆丛稿·二编》）；“天水一朝之文化，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”（《寒柳堂集》）。

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，有宋一代占据了七分之一的历史岁月。在长达三百多年的宋代，文化发达，学术繁盛，群星璀璨，远迈历代。其中做出划时代贡献，在文化艺术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，从而领袖群伦，成为当之无愧的文坛泰斗的，则有欧阳修和苏轼。即使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，他们也都是震古烁今的巨人。

在欧阳修、苏轼辉煌绚丽而又坎坷多难的人生中，又都与颍州（今安徽省阜阳市）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欧阳修在这里为官退隐并终老于颍。苏轼继恩师欧阳修之后又在此从政。他们不仅留下了至今为阜阳人追怀的德政，也写下了众多诗词及一些文史等方面的传世著述；既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，也给阜阳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在欧阳修、苏轼之后的九百多年里，学人对他们的研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，并取得丰硕成果。但是，对欧阳修、苏轼在颍州的活动及创作进行全面的专题研究，至今仍未引起充分的重视，尚属一项有待深入开发的重要课题。

九百多年来，阜阳人一直以欧阳修、苏轼曾经做过颍州太守为

骄傲,有着浓厚的欧、苏情结。欧、苏在颍州留下的作品,特别是他们在颍州所写以及所写关于颍州的诗词,更为阜阳人所珍视。但这部分诗词究竟有多少,却一直没有人全面汇集整理过,从而,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专集。另外,由于年代久远等方面的原因,这些作品对于今天的相当一部分读者来说,在阅读和理解方面有着一定的困难和障碍。“诗家总爱西昆好,独恨无人作郑笺”(元好问《论诗》)。《欧阳修苏轼颍州诗词详注辑评》,就是一部旨在对欧、苏在颍州所写以及所写涉及颍州的诗词进行全面汇辑、注释与评论的专题著作。

欧阳修的颍州诗词,大略可分为知颖诗、思颖诗、归颖诗三部分,共约一百六十多首。

欧阳修结缘颍州是在皇祐元年(1049)。是年正月,他以目疾为苦,自请由扬州移知颍州并得俞允,以行起居舍人、知制诰、知颍州军州事(习称太守),于二月十三日由水路抵达颍州。在其晚年所作《思颖诗后序》中,他说:“皇祐元年春,予自广陵得请来颖,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,土厚水甘而风气和,于时慨然有终焉之意也。”欧阳修知颖期间,正值风调雨顺之年,颖为小郡,政事不繁。虽在第二次遭贬之后,但已得到了朝廷的一定宽宥,欧阳修心灵的创伤有所平复,心情相对平静。在一年半时间内,他写下“知颖诗”近六十首。

欧阳修于二月到颖不久,就爱上了颍州西湖。三月视事(办公)之初,便带领僚属同游西湖。知颖期间,他写下了《初至颍州西湖,种瑞莲、黄杨,寄淮南转运吕度支、发运许主客》、《祈雨晓过湖上》、《西湖戏作示同游者》、《三桥诗》、《飞盖桥玩月》等一批咏赞颍州西湖的佳作名篇。留下了“平湖十里碧琉璃,四面清荫乍合时”、“渺渺平湖碧玉田”、“都将二十四桥月,换得西湖十顷秋”等咏赞颍州西湖的名句。北宋时期,随着欧阳修这些清诗妙句的传抄流布,

颍州西湖的美名也广播于天下，至今仍为阜阳人广泛吟诵。

颍州虽为小郡，却地处北宋都城开封与江南吴越富庶之地的水陆交通要冲。时年四十三岁的欧阳修，在文坛的领袖地位已经形成，宋人叶梦得说：“庆历后，欧阳修以文章擅天下，世莫敢有抗衡者。”（《避暑录话》卷二）他在颍州的创作活动，对全国都产生了影响。

欧阳修知颖期间，不仅有官员、文士路过或枉道来颍州拜访欧阳修，亦有青年才俊慕名专程问学于欧阳修。僚属及地方也有不少名士，会聚在欧阳修周围。据《宋史·吕公著传》：吕公著“通判颍州，郡守欧阳修与为讲学之友”。“时刘原甫、王深甫皆寓居郡下，四人相从讲学为事，情好款密”（宋·阙名《南窗纪谈》）。据文献记载，由于欧阳修的到来，当时颍州的文学活动十分活跃。皇祐二年正月初七聚星堂宴集，欧阳修与吕公著、刘原父、魏广、焦千之、王回、徐无逸等作分韵诗，赋室中物、席间果、壁间画像，每人每物均赋诗一首，“诗编成一集，流行于世，当时四方能文之士及馆阁诸公，皆以不与此会为恨”（宋·朱弁《风月堂诗话》）。后降小雪，欧阳修在聚星堂赋《雪》诗，创“禁体物语”新诗体，“自后四十年，莫有继音”（宋《王直方诗话》）。

这些诗词，不仅反映了北宋时期颍州的风土人情，也反映了欧阳修当时的思想状况。在一些诗作中，欧阳修议政议文，引起了当时政界和文坛的关注。今天，解读这些诗词，对欧阳修及阜阳地方历史文化研究，都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。

欧阳修知颖虽仅有短短一年半时间，但颍州却成了他魂牵梦萦的“故乡”。以后，不管他改知应天府，升迁京师开封，改知青州、亳州、蔡州，均在诗文信札中表达了思念颍州之情，而且愈近晚年，思念愈深。他在《思颖诗后序》中说：“尔来俯仰二十年间，历事三朝，窃位二府，宠荣已至而忧患随之，心志索然而筋骸惫矣。其思颖之念未尝少忘于心，而意之所存亦时时见于文字也。”